

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贫困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

——基于赣南苏区的入户调查数据分析¹

边俊杰¹、赵天宇²

(1. 赣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江西赣州 341000; 2. 江西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江西赣州 341000)

【摘要】:近年来,精准扶贫政策促进了农村贫困居民家庭收入的快速增长。在收入增长之后,该政策必然会对农村贫困居民家庭的消费行为和消费结构产生影响。结合江西省某县315户的入户调查数据,并将数据分为扶贫组和控制组,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对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贫困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估计。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贫困居民消费影响显著,其中居住支出和教育支出的促进作用最大,分别提高31.3%和47.7%;精准扶贫政策对通讯支出、其他支出和衣着支出的影响程度略低;对食物支出和交通支出的影响程度最小。在精准扶贫政策深入推进的过程中,需要重点挖掘帮助贫困户增收、制订可持续脱贫效果的政策,淘汰无效率的扶贫政策,降低扶贫政策成本。同时实施贫困户精准扶贫政策分类管理,加强不同类型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评估,密切关注贫困群体消费需求的变化,进一步精准施策。

【关键词】:精准扶贫 农村贫困居民 家庭消费

【中图分类号】: F32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972(2019)01-0063-11

一、问题的提出

2015年11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这意味着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已经吹响。同年12月,中共中央授权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2017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那么,精准扶贫政策的有效性如何?扶贫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会带来哪些影响?精准扶贫政策能否改变居民消费模式,进而激发其内在的可持续脱贫动力?

近年来,关于扶贫政策的研究成果主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贫困测量研究。基于多维贫困理论,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出发对中国农村的贫困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如王小林和Alkire(2009)关注了贫困发生的多维度特征,提出了多维贫困的观点,并从多个维度设置指标创建了一套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在此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扶贫政策创新的思路。^[1]李佳路(2010)进一步分析了多维贫困因素的贡献度,并针对不同贡献度提出针对性的建议。^[2]李俊杰和李海鹏(2013)则进一步应用多维贫困

¹收稿日期:2018-10-16 修返日期:2018-12-17

基金项目:江西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双重差分法视角下稀土产业规制政策对定价权的评价研究”(GJJ170541)

作者简介:边俊杰,赣南师范大学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博士后,主要从事财政理论与政策研究,通讯作者联系方式76060742@qq.com;赵天宇,江西理工大学讲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宏观经济政策研究。

理论测量了民族贫困地区贫困程度，并提出了减贫措施。^[3]第二，扶贫模式与扶贫项目的问题分析。随着研究的深入，关于贫困领域的研究触角进一步拓展到了扶贫模式和扶贫项目。如李志萌和张宜红（2016）针对赣南老区产业扶贫模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分析了其内在机理及破解路径，他们提出了“六统一”的扶贫贫困破解路径。^[4]汪三贵等（2015）聚焦精准扶贫项目，分析了项目到户后的精准性和扶贫项目资金管理与分配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5]第三，扶贫政策的效益或效果评价研究。目前我国扶贫工作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研究的视角开始集中于扶贫的效果评价。如肖云和严茉（2012）从扶贫政策认知的角度考察了农村贫困群体对现行扶贫政策的满意程度，并应用这一满意度指标分析了减贫效果的影响程度。^[6]张琳等（2017）应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湘鄂渝黔边远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效益进行了实证研究。^[7]姚洪心和王喜意（2009）从劳动力流动、教育水平与扶贫政策的关系入手，深入分析了不同收入来源和收入类型的差距。^[8]高幸（2017）分析了扶贫政策对贫困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9]胡晗等（2018）应用 Probit 模型和粗略精确匹配方法，进一步对农村种植收入、养殖收入、经商收入、务工收入等不同收入来源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指出了不同产业扶贫政策对不同收入来源的影响。^[10]陈清华等（2017）研究了扶贫政策对受益目标群体的影响。^[11]

从现有的扶贫政策效果研究的文献来看，其研究方法和内容逐步从规范性研究转向实证研究，开始用数据实证扶贫效果的大小。但是，从总体上讲，实证分析的文献还比较有限，且这些政策效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某项扶贫政策对收入的影响。同时，现有文献在扶贫政策对贫困家庭收入的增长反过来如何影响其消费行为和消费结构方面，则关注不够。另外，现有文献较少涉及从单一精准扶贫政策到系列精准扶贫政策对消费的综合作用研究。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数据来源的难获得性。比如，针对单个农村贫困家庭的收入数据，则可以通过当地的贫困户建档立卡信息以及官方的脱贫评价结论可以获得，但是对于贫困家庭的消费数据采集存在较大难度，缺乏大规模的实地调查数据，且很难单独测算扶贫政策对贫困户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当前脱贫攻坚已经进入决胜阶段，扶贫对象发生了新的变化，扶贫的主要对象则聚焦于深度贫困人口。从深度贫困人口的特点来看，单一的精准扶贫政策或者简单维度的精准扶贫政策很难对深度贫困的脱贫实现有效发力，即便是多维度的精准扶贫政策，对于深度贫困的人口而言，也存在不同的收入反应和消费行为等。

近年来，随着精准扶贫的纵深推进，深度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政策表现出多样化、多维度的态势，以赣南老区为例，推出的精准扶贫政策就涵盖了近 20 余项，包括社保扶贫、产业扶贫、教育健康扶贫、金融扶贫等。这些精准扶贫政策对于深度贫困人口而言，提高了其收入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收入的提高所带来的消费行为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是否能够反映这部分人群寻求可持续脱贫的内在动力，而这一问题则需要深入研究。本文立足于这一角度，以精准扶贫政策对深度贫困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影响为理论逻辑，以赣南苏区深度贫困居民为对象，通过实证研究深入探讨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贫困居民家庭增收及消费的影响，进而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二、理论分析

（一）基于多主题家庭调查方法的精准扶贫政策

从基本逻辑上讲，现有的精准扶贫政策的出台是基于多维度贫困标准认定的，是通过多主题家庭调查方法对贫困人口的贫困原因和贫困程度的确定为前提。

以赣南革命老区推行的精准扶贫政策为例，本文课题组应用多主题家庭调查方法对地方政府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或贫困人口进行调查，发现致贫的原因包括因病致贫、受教育水平低下不能适应市场化的收入机制而致贫、年龄偏大或重大疾病而丧失劳动能力致贫、当地产业发展受限而致贫等多维度因素。针对致贫原因的多维性，赣南革命老区精准扶贫政策涵盖的政策有以下十几种：社会保障扶贫、教育扶贫、产业扶贫、培训就业扶贫、健康扶贫、易地搬迁扶贫、光伏项目扶贫、分红资产收益扶贫、水利电力条件改善扶贫、“互联网+”农产品电商扶贫、金融扶贫等。

从政策的具体内容看，大体上分为两类：一是公共支出政策，如社会保障扶贫、教育扶贫、培训就业扶贫等。二是扶贫项

目，如光伏发电与分红资产收益扶贫等产业扶贫政策。

（二） 贫困人口或家庭消费行为结构对精准扶贫政策的反应假定

作为贫困人口或家庭，对政府支出和扶贫项目具有相应的行为反应方式。具体假定如下：

贫困人口消费行为对精准扶贫政策包的反应假定 I：基于目前政府部门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建档立卡的行为，可以判定精准扶贫对象构成了精准扶贫政策的效益归属。政府财政支出政策扶贫从性质上讲属于政府资金向贫困人口的转移和再分配，相当于增加了相应的福利，构成了贫困人口的隐性货币收入。考虑到政府转移支出的精准指向性，如果政府取消这些构成贫困人口或家庭的隐性货币收入政策，那么对于这些贫困家庭而言，将不会存在其他同样性质的家庭消费行为反应的替代收入。除此之外，财政支出政策也可以有效地增加贫困居民的就业能力和机会。

贫困人口消费行为对精准扶贫政策的反应假定 II：扶贫项目等产业扶贫政策是具有市场化特点政府干预行为。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或家庭同样构成了扶贫项目的效益归属群体。如果当地政府不能推出这些扶贫项目，对于这些贫困人口和家庭而言，为了保证家庭的可持续发展，其自身必须面向市场寻求替代性的收入。由于扶贫项目的实施，在降低了自身寻求替代收入搜寻成本的同时，构成了这部分家庭消费行为反应的显性货币收入。

（三） 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人口或家庭消费影响的叠加效应

1. 公共支出扶贫政策对贫困人口或家庭消费行为的挤入效应

第一，公共支出扶贫政策大多属于财政转移支出或财政民生支出，由于这类支出具有精准指向性，有别于常规的政府转移支出或民生支出。从政策叠加角度上讲，贫困人口或家庭与普通居民或家庭相比，享受了双重政策红利，这一政策红利带来的资金的转移能够提振消费，带来互补配套的消费支出。国内学者的前期研究成果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如徐绿敏（2013）的研究认为政府转移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虽然比较微弱，但仍具有积极的影响。^[12]袁华萍（2015）认为财政转移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呈现库兹涅茨“倒 U”曲线特征，在转移性支出增长的初期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成正相关关系，经过拐点以后其影响程度将减缓。^[13]本文认为，根据传统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贫困人口或家庭由于整体消费水平偏低，收入水平有限，在最初接受这一政策时，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增，存在挤入效应，能够有效地提升消费。

第二，部分公共支出扶贫政策如教育扶贫、培训就业扶贫、健康扶贫等，能够带来贫困人口劳动技能、智力和健康水平的大幅提升，这种提升一方面导致了贫困户提高了自身对其他资源的利用程度；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接受培训就业再教育来增加互惠、信任及可利用的社会网络资源，提高其社会地位。这对于贫困人口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家庭收入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有助于增强消费信心。

2. 扶贫项目对贫困人口或家庭消费影响的增收效应

扶贫项目作为反贫困的重要手段，地方政府在布局这些项目时不是随机的，而是根据偏好值匹配的原则对贫困群体推出的。言外之意，当地的非贫困居民则是排除在外，不享受项目的红利。扶贫项目常常表现为各贫困地区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推出的农林产业、乡村旅游、光伏发电等项目，其主要目的是增加贫困户收入。扶贫项目可以视为贫困户增收的杠杆，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在得到激发的同时，也能实现与贫困区域（贫困村）非贫困居民的协同发展。扶贫项目可以帮助贫困人口或家庭收入来源方式实现多样化，抗风险能力逐步增强，从而实现贫困家庭原始的资本积累，最大限度地实现家庭资本运用，走向可持续脱贫。

政府扶贫项目的推出，在拓展贫困居民多样化的收入来源方式，增强抗风险能力的同时，减少了不确定性，提高了这部分

群体对未来长期收入的预期。根据弗里德曼持久收入假说，从长期来看，居民的消费行为并不是依据当期的收入水平做出的，而是根据长期的持久收入水平来进行决策。因而，贫困居民可以依托扶贫项目的长期增收的预期，改变消费结构，提高消费水平。

三、研究方法、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赣南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原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新中国成立以来，赣南苏区逐渐失去了交通、产业等优势，形成了全国较大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在深度贫困人口中，据江西省财政厅公布的数据，截至 2017 年 12 月，江西省还有 269 个深度贫困村，其中近一半的人口在赣南。因此，本文以赣南老区为研究对象，基于赣南老区一县包括非贫困家庭和贫困家庭在内的 315 户农村居民的人户调查数据，考虑农村居民享受精准扶贫政策与不享受扶贫政策的自选择特征和家庭异质性特征，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从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两个层面检验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一) 研究方法

为了实证检验扶贫政策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最直观的方法是通过构造线性回归方程利用 OLS 方法来估计扶贫政策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带来的平均影响。然而，若假定享受精准扶贫政策和未享受(即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效应)就能够无偏地反映扶贫政策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但事实上，精准扶贫政策在农户之间的分配是具有针对性和有导向的，是在农村居民家庭条件的基础选择的。所以直接利用 OLS 估计会造成回归系数有偏差。

因此，本文应用 Rosenbaum 和 Rubin(1983)开发的倾向得分匹配法(PSM)，^[14]将样本分为两组：(1)享受精准扶贫政策的一组(以下简称扶贫组包括样本中所有享受扶贫政策支持的农户；(2)控制组，包括那些没有享受扶贫政策支持的农户，并保证两组样本农户之间只有精准扶贫政策的享受有区别。同时将扶贫组和控制组消费支出进行比较并计算其差值，即同一户家庭享受与未享受扶贫政策的家庭消费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effect on the Treated, 缩写为 ATT)。

在此，先简单介绍如何计算 PS 值，即利用 PSM 方法获得倾向得分(PS)，它衡量的是享受精准扶贫政策包一组和控制组在多维视角下的匹配程度。然后讨论不同匹配方法下的平均处理效应(ATT)。

1. 倾向得分

倾向得分被 Rosenbaum 和 Rubin(1983)定义为“在一定协变量条件下，一个观察对象可能接受某种处理(或暴露)因素的可能性”。^[14]

$$p(X)=Pr[D=1|X]=E[D|X] \quad (1)$$

其中，X 表示控制组的多维变量特征。D 表示指示变量，若 D=1，则表示农户家庭享受精准扶贫政策支持；若 D=0，则表示农户家庭未享受精准扶贫政策支持。理论上，如果我们可以得到倾向得分 $p(X_i)$ 的估计值，则 ATT 就可以将被享受精准扶贫政策扶贫组和控制组的潜在结果差异估计出来。

$$ATT=E[Y_{1i}-Y_{0i}|D_i=1]=E\{E[Y_{1i}-Y_{0i}|D_i=1], p(X_i)\}=E\{E[Y_{1i}|D_i=1]-E[Y_{0i}|D_i=1], p(X_i)\} \quad (2)$$

其中， Y_{1i} 和 Y_{0i} 分别表示扶贫组和控制组的潜在结果。

为了估计 PS 分值, 借鉴 Dehejia 和 Wahba(2006) 和 Lewbel(2003) 的研究。^[15~16] 本文利用 Logit 模型来进行计算。具体公式如下:

$$p(X_i) = \Pr[D_i = 1 | X_i] = \frac{\exp(\beta x_i)}{1 + \exp(\beta x_i)} \quad (3)$$

其中, X 代表的是可能影响农村居民享受精准扶贫政策包的多维协变量, β 表示协变量的相关系数。倾向得分 (PS) 就是 Logit 模型的预测值。

2. 匹配模型

虽然倾向得分已经被估计出来, 但是在下面的实证分析中, 仍不能直接利用式 (2) 来估计 ATT 值。原因是 $P(X)$ 是一个连续变量, 因此它有可能为两个单元找到完全一致的倾向得分。现有研究给出了几种匹配方法来克服这一问题。最常用的三种方法是最邻近匹配法、半径匹配法和核匹配法。

最邻近匹配法的原理是从扶贫组估计的 PS 值中通过向前或向后搜索最接近的控制样本。假定 T 和 C 分别表示扶贫组和控制组, Y_i^T 和 Y_j^C 分别表示扶贫单元和控制单元观察到的绩效结果。与此同时, 假定表示控制单元匹配到第 i 个扶贫单元 (估计的倾向得分为 p_i) 的集合, 那么, 最邻近匹配法就可以表述如式 (4):

$$C(i) = \min_j |p_i - p_j| \quad (4)$$

半径匹配法的原理是搜索控制组里的所有单元, 其中那些估计的倾向得分落入扶贫单元 i 的倾向得分 p_i 的半径范围为 r 范围内单元都被予以匹配。 r 是预先设定的一个正实数。我们可以将半径匹配法表述如式 (5):

$$C(i) = \{p_j | |p_i - p_j| < r\} \quad (5)$$

在使用最邻近匹配法或半径匹配法识别匹配样本之后, 我们就可以计算 ATT。用 N_i^C 来表示与观察对象 i 匹配的控制组的数量, 并定义权重 $\omega_{ij} = 1/N_i^C$, 如果 j 属于 $C(i)$, 否则 $\omega_{ij} = 0$ 。同时, 假定 N^T 是扶贫组观察样本的数量。那么, 依据 Becker 和 Ichino (2002) 的研究,^[17] ATT 可以被估计如式 (6):

$$\tau^M = \frac{1}{N^T} \sum_{i \in T} Y_i^T - \frac{1}{N^T} \sum_{i \in C} \omega_j Y_j^C \quad (6)$$

其中, M 表示匹配方法, 比如最邻近匹配法或半径匹配法; ω_j 被定义为 $\omega_j = \sum_i \omega_{ij}$ 。假定权重保持不变, 并且对每个居民而言, 扶贫政策的有效性是独立的。那么, 可以估计如式 (7):

$$\text{Var}(\tau^M) = \frac{1}{N^T} \text{Var}(Y_i^T) + \frac{1}{(N^T)^2} \sum_{i \in C} (\omega_j)^2 \text{Var}(Y_j^C) \quad (7)$$

核匹配法的原理在一定意义上有别于上述两种方法。在核匹配方法下，将构造一个虚拟单元来匹配每一个扶贫单元，也就是说，每一个扶贫单元与所有控制单元的加权平均相匹配，其中权重与控制单元和扶贫单元的倾向得分的距离成反比。当采用核匹配法时，ATT 可以被估计如式 (8)：

$$\tau^K = \frac{1}{N^T} \sum_{i \in T} \left\{ Y_i^T - \frac{\sum_{i \in C} Y_j^C G[(p_j - p_i)/h_n]}{\sum_{i \in C} G[(p_j - p_i)/h_n]} \right\} \quad (8)$$

其中， $G(\bullet)$ 表示高斯核函数， h_n 表示带宽参数。在带宽和核的标准条件下，可得：

$$\frac{\sum_{i \in C} Y_j^C G[(p_j - p_i)/h_n]}{\sum_{i \in C} G[(p_j - p_i)/h_n]} \quad (9)$$

式 (9) 是反事实结果 Y_{0i} 的一致估计量。由于很难获得 γ^K 的方差估计量，因此，要用到自抽样方法。我们应用同样的匹配方法，并基于 500 次的自抽样来估计 γ^K 的方差。

3. 利用自抽样获取稳健性的 ATT 方差

本研究统计分析中的一个问题是样本量较小。为了减少小样本偏差，本文利用自抽样方法来估计进一步分析的标准误差。借鉴 Efron 和 Tibshirani (1993) 的研究。^[18] 具体操作如下：第一，从原始样本中有放回的重复抽取 n 个观察样本，从而得到实证样本。第二，利用上述匹配方法来计算 ATT_i 。第三，对第一步和第二步重复 K 次（本文中 $K=200$ ），获取 $ATT_1, ATT_2, \dots, ATT_{200}$ 。第四，计算 $ATT_1, ATT_2, \dots, ATT_{200}$ 的标准偏差，从而获取 ATT 统计量的标准差。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1. 数据来源

本文分析所采用数据来自赣南师范大学调研组对赣南苏区某县某镇 12 个样本村 315 户农户的实地问卷调查，调查时间为 2017 年 8 月至 2018 年 1 月，历时 6 个月。在 12 个样本村都已实施精准扶贫政策，并从样本村随机抽取在册贫困户 197 户（扶贫组），非贫困户 118 户（控制组）；然后对样本村所有在册贫困户以及非贫困户进行入户访谈式问卷调查。访谈的内容包括家庭户主姓名、家庭人口数、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含人均收入）、土地面积、各项消费支出等信息。

2. 变量测量

本文主要研究扶贫政策对农村贫困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参考相关研究，农村居民家庭消费主要包括食物支出、衣着支出、居住支出、家庭设备支出、文教娱乐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交通通讯支出以及其他消费支出等类型。根据实地调研，贫困户主要的支出方式有食物支出、衣着支出、交通支出、教育支出、通讯支出、居住支出以及其他支出（据调查发现，主要包括烟酒等消费支出）。因此，本文选取的因变量主要以实地调研的结果为准，以贫困户在家庭消费各项支出的年度数据进行考察。

参考相关研究，本文选取的匹配变量包括：（1）户主特征。户主在家庭决策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研究中引入户主年龄（包括平项）以及学历水平 3 个变量。（2）家庭特征。家庭特征是影响家庭消费决策的重要因素（李江一和李涵，2017）。%

家庭特征包括家庭经济状况和人口特征两个方面，其中将家庭经济状况测量为家庭总收入、人均纯收入、土地资产 3 个变量，将家庭人口特征测量为家庭规模。

表 1 给出了扶贫组和控制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以及两组样本在不同消费层面反映出的不同结果。从消费总量来看，扶贫组的家庭消费总支出比控制组的家庭平均高出 3079 元。从消费结构来看，扶贫组的家庭各项消费支出均高于控制组的家庭，其中教育支出和食物支出三类消费支出的差异最大。从各项消费支出所占比例来看，现阶段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主要集中在食物上，占比超过三分之一，其次是教育支出、居住支出和衣着支出，这充分说明尽管当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仍集中基本生活消费上，但也开始重视对教育的投入。直观来看，扶贫政策对促进农村贫困居民家庭消费具有积极影响。但由于外生性问题，表 1 中所呈现的结果需要通过建立计量模型来检验。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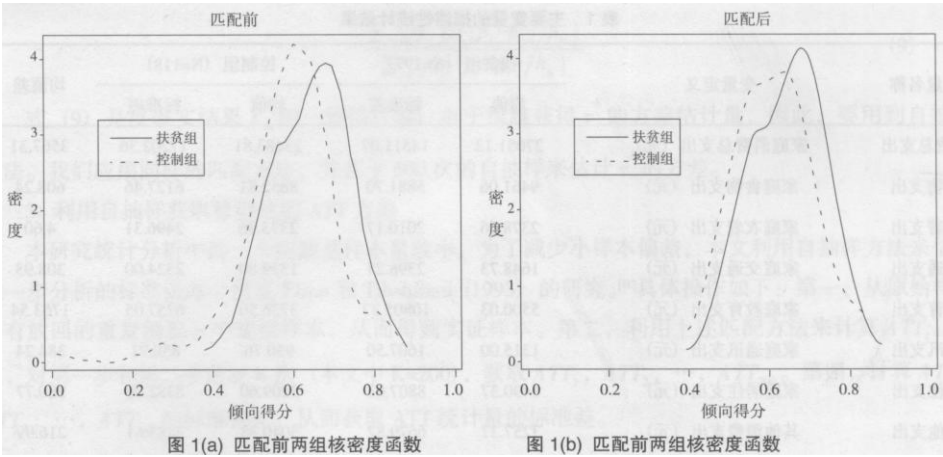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扶贫组 (N=197)		控制组 (N=118)		均值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消费总支出	家庭消费总支出（元）	27051.12	14511.07	23483.81	17202.36	3567.31
食物支出	家庭食物支出（元）	9461.06	5881.70	8852.81	6127.46	608.24
衣着支出	家庭衣着支出（元）	2378.56	2010.17	2373.96	2496.31	4.60
交通支出	家庭交通支出（元）	1648.73	2398.27	1339.80	2324.00	308.93
教育支出	家庭教育支出（元）	5500.03	10805.37	3736.50	6257.05	1763.54
通讯支出	家庭通讯支出（元）	1315.00	1607.50	930.76	850.71	384.24
居住支出	家庭居住支出（元）	3490.37	8807.63	3209.60	8382.90	280.77
其他支出	其他消费支出（元）	3257.37	6679.82	3040.38	3483.61	216.99
户主特征						
年龄	户主年龄（岁）	61.01	9.99	58.20	10.24	-2.80
年龄平方	户主年龄平方/100	38.16	11.55	34.86	11.94	-3.30
受教育程度	文盲、半文盲=1;小学=2;初中=3;					
	高中=4;中专、技校、职高=5;大专=6;本科=7;硕士及以上=8					
受教育程度高中	中专、技校、职高=4;大专=5;本科=6;硕士及以上=7	1.39	0.75	1.49	0.86	0.10
家庭特征						
家庭年收入	家庭年收入（元）	50761.19	64287.54	36253.45	59983.81	14507.74
人均年收入	人均家庭年收入（元）	9692.47	11395.63	7467.90	14562.37	2224.57
人口数	家庭人口数量（人）	5.19	2.05	5.52	2.22	0.32
土地面积	家庭土地面积（亩）	3.28	2.50	2.94	2.32	-0.34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样本匹配结果

本文基于最邻近匹配法计算了扶贫组和控制组匹配前和匹配后的核密度函数，图 1（a）和图 1（b）给出了两组匹配前后的核密度函数对比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两组的核密度函数在匹配前有明显差异。前面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利用控制组中所有的家庭与扶贫组进行对比，从而导致结果有偏差。相反，我们基于倾向得分从控制组中选取一些家庭来匹配扶贫组，匹配之后，

如图 1（b）所示。两组的核密度函数呈现相似，这表明匹配后两组变量的特征是相似的。此外，半径匹配法和核匹配法的匹配结果也是相似的，因此本文没有报告。



（二） 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贫困家庭消费支出与消费结构的影响测算

为了进一步深入分析精准扶贫政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需进一步检验匹配质量。检验匹配质量的目的在于消除扶贫组与控制组这两组样本之间变量的匹配差异。通过平衡性检验的结果可以判断，本部分对上述样本进行匹配质量检验后，扶贫组与控制组之间所有匹配变量的标准差在小于 10%范围之内，符合 Rosenbaum 和 Rubin（1983）提出的标准差应小于 20%的建议，^[14] 并且 t 检验不能拒绝扶贫组与控制组无系统性差异的原假设。此外，Pseu0-R2 在匹配后比匹配前低，LR 统计量不显著，符合 Leuven 和 Sianesi（2003）的实证研究结论。^[20] 表 2 至表 3 中的模型检验结果均符合要求。

表 2 的结果表明，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总支出的影响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与此同时，扶贫政策对不同类型产品消费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居民居住支出和教育支出的促进作用最大，分别提高 31.3%和 47.7%。这与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可持续脱贫导向一致。扶贫政策对通讯支出、其他支出和衣着支出的影响程度相近，分别提高 20.2%（187.37 元）、16.9%（255.88 元）和 10.2%（262.83 元）。扶贫政策对食物支出和交通支出的影响程度最小，分别是 4.5%和 4.6%。

表 2 扶贫政策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 ATT 测算结果（基于最邻近匹配法）

消费支出	最邻近匹配法（1 口 5 匹配）				最邻近匹配法（1 口 10 匹配）			
	扶贫组	控制组	ATT	标准误	扶贫组	控制组	ATT	标准误
消费总支出	27673.62	23336.62	4337***	2268.00	27507.21	23557.91	3949.3***	2154.34
食物支出	9490.96	9017.57	473.39*	841.36	9490.96	9150.67	340.28*	799.71
衣着支出	2379.44	2116.61	262.83**	266.65	2379.44	2204.80	174.64**	256.97
交通支出	1361.92	1346.08	15.84**	314.76	1452.98	1346.08	106.91**	299.84
教育支出	5588.16	3653.52	1934.64***	1357.45	5204.83	3653.52	1551.30**	1279.53
通讯支出	1116.76	929.38	187.37*	164.18	1118.03	929.38	188.64**	155.24
居住支出	4426.90	3219.86	1207.04*	1206.51	4029.17	3219.86	809.32*	1147.43
其他支出	3309.48	3053.60	255.88**	829.37	3831.80	3053.60	778.21**	780.32

注：采用 bootstrap 抽样 200 次得到置信区间；***、**、*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表 3 和表 4 分别报告了核匹配法和半径匹配法下的 ATT 测算结果。综上所述，三种不同匹配方法测算的结果表明，扶贫政策使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总支出平均提高 3079 元，且在 1% 的显著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精准扶贫政策包能显著改善贫困居民家庭的生活水平，但这一影响小于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给出的 3567.31 元的判断。这说明，忽略农村居民家庭的外生性问题会高估扶贫政策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总量的影响。

表 3 扶贫政策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 ATT 测算结果（基于核匹配法）

消费支出	核匹配法（窗宽 0.06）				核匹配法（窗宽 0.1）			
	扶贫组	控制组	ATT	标准误	扶贫组	控制组	ATT	标准误
消费总支出	197	114	2607.33***	2016.93	197	114	2526.76***	1953.85
食物支出	197	114	525.64**	821.76	197	114	547.87**	776.55
衣着支出	197	114	165.15*	261.50	197	114	164.96*	240.23
交通支出	197	114	139.57**	248.72	197	114	191.37**	251.39
教育支出	197	114	1705.35*	1173.18	197	114	1809.46*	1163.76
通讯支出	197	114	179.28**	121.23	197	114	210.88**	141.87
居住支出	197	114	799.58***	1189.88	197	114	655.74***	1173.86
其他支出	197	114	474.35*	946.173	197	114	372.12*	856.21

注：采用 bootstrap 抽样 200 次得到置信区间；***、**、*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

表 4 扶贫政策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 ATT 测算结果（基于半径匹配法）

消费支出-	扶贫组	半径匹配法（半径为 0.005）			标准误	半径匹配法（半径为 0.01）			
		控制组	ATT	扶贫组		控制组	ATT	标准误	
消费总支出	166	105	2445.03***	2878.53	166	112	2274.86***	2267.71	
食物支出	166	105	236.95**	1020.85	166	112	671.54**	888.73	
衣着支出	166	105	234.66*	334.24	166	112	177.47*	310.11	
交通支出	166	105	223.27**	349.58	166	112	215.45**	304.55	
教育支出	166	105	1711.47**	1642.45	166	112	1958.76*	1421.38	
通讯支出	166	105	240.57***	207.89	166	112	238.12***	170.65	
居住支出	166	105	235.52*	1474.68	166	112	336.43**	1494.57	
其他支出	166	105	505.80**	1227.22	166	112	375.11**	1092.70	

注：采用 bootstrap 抽样 200 次得到置信区间；*、**、***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基于赣南苏区的人户调研数据，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研究结论：（1）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贫困居民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文章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检验得出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总支出的影响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显著提高家庭消费总支出 18.6%，这充分表明精准扶贫政策自实施以来不但能显著提高居民家庭总收入，还能有效改善家庭消费水平。

(2) 精准扶贫政策对不同类型产品消费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居民居住支出和教育支出的促进作用最大，分别提高 31.3% 和 47.7%，这符合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可持续脱贫导向；扶贫政策对通讯支出、其他支出和衣着支出的影响程度相近，分别提高 20.2%（187.37 元）、16.9%（255.88 元）和 10.2%（262.83 元），对食物支出和交通支出的影响程度最小，分别是 4.5% 和 4.6%。总体而言，精准扶贫政策包能够显著改善居民家庭的生活水平，但这一实证结果小于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在忽略农村居民家庭的外生性问题的前提下，会高估精准扶贫政策包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总量的影响。

(二) 政策建议

1. 进一步完善造血型消费的精准扶贫政策

从实证分析结果来看，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贫困居民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的显著性表明，经过一段时间的实施，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居民收入的提升是非常明显的，而收入的提升直接推动了贫困居民的消费。在脱贫不脱政策的背景下，应继续深入探讨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居民消费影响的长效机制，如适度减少财政支出等转移性支出，降低贫困居民由于政府转移支付带来的“输血消费”比重，提高产业扶贫项目带来的“造血消费”比重等。

2. 实施贫困户精准扶贫政策分类管理

在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居民消费影响非常显著的情况下，应充分考虑贫困户（已脱贫户、未脱贫户）与非贫困户两类群体之间的心理反应。从调研组在实地访谈时也发现，大部分贫困居民实际上已经脱贫，但仍能享受精准扶贫政策。这些贫困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的提升主要来源于政府补贴和转移支付，这一现象使非贫困户与脱贫户、贫困户之间存在巨大心理反差。建议将已脱贫户与未脱贫户进行分类管理，适时更新贫困户建档立卡动态信息，在保证已脱贫户造血功能的前提下，削减这些人群不具有造血功能的扶贫政策。

3. 加强不同类型精准扶贫政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效果评估

从精准扶贫政策对不同类型产品消费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差异来看，不同的精准扶贫政策对家庭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影响有差异。因此，应适时加强不同政策的效果评估，及时淘汰影响不显著、边际消费效应下降的政策，降低精准扶贫政策成本。

4. 密切关注贫困群体消费需求的转型升级

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表明，贫困居民家庭随着逐步走向脱贫，对于美好生活需要也日益提高，新的需求也日益显现。如何通过精准扶贫政策既能关注脱贫问题，又能解决消费需求同步变化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根据本文对贫困户享受扶贫政策以后对于消费的反应程度呈“倒 U”特征的假定，需要加强这部分群体的消费需求变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精准施策。

参考文献：

- [1] 王小林, Alkire S.. 中国多维贫困测量：估计和政策含义[J]. 中国农村经济, 2009, (12): 4-10.
- [2] 李佳路. 扶贫项目的减贫效果评估：对 30 个国家扶贫#发重点县调查[J]. 改革, 2010, (8): 125-132.
- [3] 李俊杰, 李海鹏. 民族地区农户多维贫困测量与扶贫政策创新研究——以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为例[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3): 127-132.

-
- [4] 李志萌, 张宜红. 革命老区产业扶贫模式、存在问题及破解路径——以赣南老区为例[J]. 江西社会科学, 2016, (7): 61-67.
- [5] 汪三贵, 张雁, 杨龙, 梁晓敏. 连片特困地区扶贫项目到户问题研究?——基于乌蒙山片区三省六县的调研[J]. 中州学刊, 2015, (3): 68-72.
- [6] 肖云, 严荣. 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对扶贫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J]. 贵州社会科学, 2012, (5): 107-112.
- [7] 张琳, 童翔宇, 杨毅. 湘鄂渝黔边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效益评价及增进策略——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 [J]. 贵州民族研究, 2017, (1): 177-180.
- [8] 姚洪心, 王喜意. 劳动力流动、教育水平、扶贫政策与农村收入差距——一个基于 multinomial logit 模型的微观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 2009, (9): 80-90.
- [9] 高象. 我国扶贫政策对农村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J]. 时代金融, 2017, (8): 118-119.
- [10] 胡晗, 司亚飞, 王立剑. 产业扶贫政策对贫困户生计策略和收入的影响——来自陕西省的经验证据[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 (1): 78-89.
- [11] 陈清华, 董晓林, 朱敏杰. 村级互助资金扶贫效果分析——基于宁夏地区的调查数据[J]. 农业技术经济, 2017, (2): 51-60.
- [12] 徐绿敏. 政府转移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 挤出还是挤入效应——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 GMM 分析[J]. 江西社会科学, 2013, (2): 53-56.
- [13] 袁华萍. 我国转移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研究——库兹涅茨“倒 U”假说检验[J].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 (2): 17-20.
- [14] Rosenbaum P., Rubin D.. The Central Role of the Propensity Score in Observational Studies for Causal Effects [J]. Biometrika, 1983, 70(1): 41-55.
- [15] Dehejia R., Wahba S.. Propensity Score-Matching Methods for Non-experimental Causal Studies [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06, 84(1): 151-161.
- [16] Lewbel A.. Estimation of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Based on Propensity Scores[J]. Econometrica, 2003, 75(2): 358-377.
- [17] Becker S. O., Ichino A. . Estimation of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Based on Propensity Scores [J]. The Stata Journal, 2002, 2(4): 358-377.
- [18] Efron B., Tibshirani 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Bootstrap[M]. London: Chapman & Hall Press, 1993: 28.
- [19] 李江一, 李涵. 消费信贷如何影响家庭消费?[J]. 经济评论, 2017, (2): 113-126.
- [20] Leuven E., Sianesi B.. Psmatch2: Stata Module to Perform Full Mahalanobis an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Common

Support Graphing, and Covariate Imbalance Testing[EB/OL]. <http://ideas.repec.org/c7boc/bocode/s432001.html>, 2003.